

# 刘东生先生与海洋

汪品先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92)

学术界谁都知道刘东生先生在第四纪、黄土研究中的历史性成就,但不见得都熟悉刘先生对发展我国海洋科学作出的贡献。作为一位野外地质学家,刘先生曾经不顾高龄亲自跨海参加考察;作为一位战略科学家,刘先生始终关心我国海洋科学,尤其是深海研究的发展。

我和刘先生近距离接触、得到刘先生直接影响的机会,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香港。香港大学两度组织东亚古环境学术讨论会,肇始两岸交流;会议期间刘先生对地球科学的远大视野,和对我们这些后辈的鼓励,至今犹在眼前。当时,正值国际深海钻探计划(DSDP)结束、大洋钻探计划(ODP)筹建之际,刘先生和国家海洋局的罗钰如局长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大洋钻探委员会,联合各方面力量呼吁我国加入 1985 年开始的 ODP 计划。尽管由于当时国家外汇困难等原因,最终未能成功,但是 80 年代的播种为 90 年代的收获准备了条件:1996 年,中国科学院地学部涂光炽主任和刘东生等多位院士关于“参加国际大洋钻探”的建议书,得到国务院批准,中国于 1998 年正式加入 ODP 计划,获得了进入国际深海探测领域的“入场券”。1999 年春,南海大洋钻探 ODP 184 航次成功,刘先生极为兴奋,在多次大会上为我国古环境研究获得的新进展倍加称赞,称赞在陆地黄土和深海沉积中取得的两千多万年宝贵记录。2003 年,《科学通报》同时刊载 184 航次初步成果的三篇综述,为此刘先生特地撰写了“点评”,称赞这是一次“地质大发现”性质的活动,是一桩“开创性的工作”。

科学和自然界一样,“有容乃大”。刘先生从黄土高原到青藏高原,脚踏实地考察、研究,但他学术的视域从不以陆地和国界为限。在进入老年之后,还不畏风浪亲临南沙登上珊瑚礁,不顾严寒远征南极考察极地冰盖。为了我国年青一代人才的成长,刘先生还指导培养了海洋地质的博士。陆地环境演变,是刘先生科学研究的基点,而与此同时他又特别注意海洋与陆地的相互作用,将海洋因素引进陆地环境演变的机制里加以研究。刘先生主持的众多科研计划中,我只参加过一项,这就是 1992~1996 年的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干旱半干旱区 15 万年来环境演变的动态过程及发展趋势”。这是一项多学科的古环境探索计划,我和孙湘君分别承担海洋和植被的两个课题。在刘先生的指导下,我们海洋的课题对海底沉积进行分析、汇总古海洋学资料,通过海陆对比第一次探讨了我国“干旱化的海洋因素和海洋记录”,揭示了边缘海的演变对内陆气候的影响,以及陆地气候演变在海洋沉积中的反映。研究成果获得的奖励,证明了刘先生从圈层相互作用的战略高度出发,领导多学科研究计划的成功。

刘先生的晚年,曾经多次来上海,和我们的研究生们座谈如何做学问,参加我们的一些国际学术活动,从亚洲古季风的讨论会,到“气候变化轨道驱动”的高级研讨班,增加了和刘先生接触的机会。很明显,刘先生最为关心的事在两头儿:一头儿是青年科学家的成长,一头儿是科学发展的战略。比如在为我国海洋科学迅速发展而高兴的同时,他敏锐地感觉到国家层面缺乏协调,而部门、地方缺乏分工的现象。于是刘先生领衔 20 多位院士上书中央领导,建议明确海洋国策、协调全国力量。虽然建议并不见得马上奏效,但相信也像 20 多年前的大洋钻探一样,有了播种才会有收成。

科学家一旦成名,就会带来其他科学家只能羡慕的优越条件。这些条件可以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拿来换取自身的利益,一种是用来争取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成功,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学术界的巨匠,会更加关心年轻人、更加投入科学研究的原因,而刘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术巨匠。如果回忆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会想起曾经在不同程度上遇见过“黄石公”式的高人,受到过鼓励、启发,以致终身受益。对我来说,刘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现在,当我们自己进入“倒计时”年龄段的时候,尤其会想起刘先生那样的治学和为人,尤其会珍惜那如金岁月,用来力争做成一点哪怕细小、却对得起未来的事情。